

共产党人的民生幸福观综论

谢元态 李冬莲*

【摘要】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民生幸福观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内核”，要同时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资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幸福，既要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也要吸取历代先贤“幸福观”的精华。与资产阶级幸福观文化内核——“我占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文化内核是“我为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最崇高的民生幸福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民生幸福观。“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民生幸福观的集中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新时代“为人民服务”幸福观的升级版。新时代的民生幸福观，具有从人口素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多维度的内涵。相应地，构建民生幸福评价指标体系也应该从六个维度展开。

【关键词】民生幸福；文化基因；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求达到全新的高度，特别强调要融入“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即要同时融通三种重要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幸福观，同样需要深入研究民生幸福观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内核”，需要阐述从马克思主义“我为之”的幸福观，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幸福观，再到“以人民为中心”幸福观的升华过程，需要多维度解读其主要内涵，以期对共产党人的民生幸福观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谢元态，江西农业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转型经济；李冬莲，江西农业大学2019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 文化基因：中西方“幸福”与“幸福观”的文化差异

（一）中国文化基因“幸福”与“幸福观”的文化渊源

在《说文解字》中，“幸福”的本义是受到他人的“护佑”。“幸”“吉而免凶也”。师古曰：“幸者，可慶倖也。故福善之事皆称为幸”；“福”“祐也”。^①在《辞海》中，“幸福”被解释为“在生活过程中内心的需要得到实现和满足时较长时间都存在的快乐感受。”因而，有幸福感的人，必然会获得满足感。但每个人的幸福感都可能会随着心态、身体、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传说尧舜时期，皋陶作为尧帝的高参，向尧帝建言治国安邦的方略说，要管理好国家，只有“在知人，在安民”。^②儒家孔子认为主观上“乐”即幸福，“不患寡”和“不患贫”，而“患不均”和“患不安”，主张“悦”在内心，“乐”则见于外，重在“反省内求”。《礼记》中“生有所依、少有所教、老有所养、人人平等、亲如兄弟”，^③其中包含“互助性”与“共生性”成分，因而是“大同”的幸福观。道家庄子认为幸福是“天福”，主张顺其自然、“安时而处顺”，蕴含“天人合一”思想。佛家慧能认为“人有七苦……此世间，众生皆苦，”^④因而，人生只有历经了生死轮回而达到涅槃后，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幸福。以墨翟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墨家学派认为幸福是建立在“爱人”基础之上的，当人与人之间有着平等且互动互利的爱时，就是幸福。管子的幸福观非常唯物实在，《管子·禁藏》中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宋朝陈敷在《农书·卷六》中说“勤劳乃逸乐之基也”，认为幸福是来自勤奋的劳动。孙中山认为，“民生”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其重中之重就是要平均和节制，土地权利平均，则能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观，资本节约，则能增加财富，只有二者兼顾，才能完全平等且幸福。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我国学者对“幸福”的理解逐渐地从个人角度上升到了社会角度的平等、大同和“天人合一”，这是超越“人道”的对“天道”的领悟。

综上，虽然朝代不断变换，但是中华民族历代学者、名人都偏重“格物”的“幸福观”，其主要的含义依然是围绕百姓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为中心而发展的，“幸福”首先是能够安居乐业，同时百姓拥有“生养之具”。

（二）西方文化基因：理性与感性的“幸福”与“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人在理智的思辨活动中所感受到的持久且神圣的自足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7页。

② 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3页。

③ 戴圣：《礼记》，贾太宏译，西苑出版社，2016，第4页。

④ 周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幸福指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08。

感。^①可见,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幸福是至高的善,是符合德性的正义及其现实活动。边沁、爱尔维修、阿里斯底波、伊壁鸠鲁持感性主义幸福观,伊壁鸠鲁的幸福观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幸福”主要是一种感觉,“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②可见,对于感性主义而言,肉体 and 感官方面所获得的享受是幸福的唯一来源,个体幸福与否则主要体现在自己感觉活得是否开心、过得是否快乐。布伦诺·S. 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进一步把“幸福”理解为“人类福祉”,认为个体是否幸福则表现在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等“福祉”方面。^③

与他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这是“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的幸福观,是对所谓“理性”与“感性”幸福、“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的超越,是人类最高境界的幸福观。

综上,我国的历代先贤都比较偏重于“格物”的“幸福观”。西方学者则从所谓“理性”与“感性”的角度理解“幸福”,认为“幸福”是一种感受——是人们对某个目标得到实现时的愉悦、快乐的感受。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大多数重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都被认为是对某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内心所获得的快乐之感。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幸福观,使“幸福观”真正达到了科学的高度。马克思从“人学”的角度去理解幸福。“人的再发现”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的“幸福”,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现时代,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幸福,既要继承并发展马克思的“幸福观”,也要汲取历代先贤“幸福观”的精华。

二 “文化内核”:不同幸福观之本质差异及其典型案例分析

(一) “文化内核”及“我为之”“我占之”释义

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会固化成不同的信仰,并逐步沉淀为不同的文化。在个性化信仰和文化主导下,幸福观也因人而异。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人和群体、党派、政权组织,会有不同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必然会“羽化”成为一种特定的幸福文化。

不同的人和群体、党派、政权组织,会有不同的幸福观及其特定的幸福文化。就全社会而言,虽然幸福文化的内容可能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但是我们可以把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邓安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0~13页。

②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7,第309、239、556页。

③ [瑞士] 布伦诺·S. 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7页。

幸福文化抽象出“文化内核”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以“我为之”为“文化内核”的幸福观，另一种是资产阶级以“我占之”为“文化内核”的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文化内核”是“我为之”，即“我”是将“为他人”创造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并且因通过自己的奋斗而使他人或集体或社会或民族或人类获得幸福而为自身的幸福。这种具备“我为之”内核的幸福观是神圣的、伟大的，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文化内核”是“我占之”，即“我”是以“占有”权力或地位或金钱或荣誉作为自己的幸福。这是人格完全扭曲了的可耻的“幸福观”。

（二）“我为之”幸福观与“我占之”幸福观的本质差异

1. 古今中外，“我为之”是人类最优秀分子的人生幸福观

中国古代的最优秀分子认为，“我”之“福”是因“庇祐”他人而得到。如墨子认为“幸福”要建立在“爱人”的基础之上，当你懂得如何“爱人”，并且无论何时何处都能够以“爱人”作为行事准则，便是幸福。可见，在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中，最优秀的幸福观都是通过“我为之”使他人幸福，以他人幸福为幸福，是一种崇高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中国传统追求“天下大同”、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都是“我为之”的最崇高的幸福观。

2. 有阶级以来，“我占之”是人格扭曲和异化了的人生幸福观

古今中外，自有阶级及阶级剥削以来，以“我占之”为幸福的观念被不少人所崇尚。尤其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在“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在片面理解“经济人”“利己心”的观念熏陶下，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被认为“天经地义”，甚至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也被认为“可以理解”。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以占有（拥有）权力与地位、金钱与财富、声誉甚至虚荣为幸福。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以“我占之”为“文化内核”的幸福观。这种“我占之”的幸福观一旦占统治地位，人的灵魂便充满铜臭，“人”的本质便彻底“异化”了。同理，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旦被“我占之”的幸福观所统治，便会失去“人心”、失去群众，便会走向反动和堕落。

（三）典型案例：国民党幸福观从“我为之”向“我占之”的蜕变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具有强烈的“我为之”意识，起初选择当医师以治病救人，后来意识到只有唤醒同胞们的自尊，唤醒他们的精神，打击封建腐朽的统治者，这样才能拯救，让人民脱离苦海。他毕生都在为唤醒同胞而奋斗。20世纪初，孙中山投身革命，广泛宣传“天下大同”思想，希望“天下为公”，倡导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能主动愿意为同胞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劳动。孙中山先生提出资产阶

级革命派政党国民党“我为之”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本义是确定了国民党的宗旨就是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国富民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公平平等”的社会状态。换言之，孙中山先生描绘了“我”（国民党）要为民族谋发展，为人民谋权利、为民生谋幸福的“我为之”的美好愿景。

但是，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逐步篡取党政军大权，孙中山先生“我为之”的幸福愿景随之毁灭，国民党由一个“我为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政党，完全蜕变成为一个“我占之”的封建专制权和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混合体，蜕变成一个“我占之”的反动政党。蒋介石凭借其把持的政权进行法西斯独裁，以“我占之”作为幸福的“标准”。对外充当着帝国主义的爪牙，对内发动反革命政变。抗战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忽视群众福祉，倚仗有美援作后盾，再次挑起内战，置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彻底暴露了他反人民和反革命的丑恶嘴脸。

蒋家王朝将“民权”蜕变成为专制的工具和手段，“民生”成为亿万国人的“民不聊生”。从幸福观角度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是以“我占之”为其幸福文化“内核”的，是资产阶级追崇的极端价值观。而“权”与“利”对“我占之”的满足，只是“拜物教主义”魔化快感。历史也已证明，国民党在“我占之”观念支配下，失去“人心”，失去群众，走向反动和堕落，最终被人民所唾弃。

三 “我为之”：马克思主义民生幸福观的“文化内核”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最崇高的民生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文化内核”是“我为之”——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①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还包括了非常系统而深刻的“人学”理论，社会发展理论与“人学”理论相互补充，构成极为庞大的理论体系——为全人类求解放的理论体系。全人类获得解放，就是每个人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既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性，也摆脱了对“人”的依赖性，人人都拥有时间、空间、个性和精神的充分自由，人人都能获得“全面”的发展。这就是人类最高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无压迫、无剥削、人人平等自由的幸福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世人所揭示的最崇高的幸福观。

（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民生幸福观

《国际歌》唱道：“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最后的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9页。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①《国际歌》蕴含的民生幸福观，是属于无产阶级奋斗不息的幸福观，是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平等的人类共同理想的幸福观。在共产主义旗帜和《国际歌》的感召下，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有许多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敬仰。

白求恩大夫“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②奥地利医生理查德·傅莱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他为中国人民默默耕耘了65个春秋，是中国研制使用初制青霉素的第一人，是开创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工程的功臣。德国白衣战士汉斯·米勒博士在中国工作长达55年，他到延安后立志“要像白求恩一样，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贡献一切”。后来他研制出我国第一套乙肝检测试剂盒和疫苗。

“切格瓦拉是一位阿根廷人，信仰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生都在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努力奋斗。”（周恩来语）为古巴和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苏联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率一支“达沙式”轰炸机队伍来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铁夫，后来成为中共党员，在恶劣环境下从事党的工作，组织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中国的阴谋。印尼共产党员艾地五次访华，1965年10月在苏哈托掀起的大屠杀中不幸遇难，毛主席写下《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美军汽油弹击中而牺牲的毛岸英，为救落水儿童崔莹而牺牲的罗盛教，舍身堵枪眼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等，都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民生幸福观是中国乃至全人类民生幸福观的楷模。

四 “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民生幸福观的集中体现

“为人民服务”由毛泽东于1939年2月首次提出，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并被确定为党的宗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既有非常丰富的论述，又有感人至深的身体力行。

（一）“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将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文理想相结合，凝聚和升华成为完整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及相关方法，他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

^① 《国际歌》，作词：欧仁·鲍狄埃，作曲：皮埃尔·狄盖特，翻译：萧三。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9页。

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 习近平对新时代“为人民服务”做出了新的解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其理论基础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上帝”。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③

（二）“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职

在我国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对于“幸福观”都有精辟的论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当时的基本国情，认为民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所有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其含义就在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像盐、米、房子和衣物以及生小孩等这些基本的生活所需都没有问题。

周恩来是“人民勤务员”的典范，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④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使为人民谋利益成为衡量改革开放利弊得失的根本标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重点在于“民富”。江泽民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强调民生的关键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解决人民的就业和工作问题。胡锦涛认为民生重在科学发展，要贯穿“以人为本”理念，保障群众的受教育权，解决好群众就业、医疗和住房等问题。“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习近平以极高境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天职。“无我”是一种无私的“忘我”，夙夜在公、忘我治国理政，无私地服务于人民；“无我”是一种无畏的“舍我”，是无愧的“真我”。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嘴上喊喊口号，而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办事，为人民谋利益和幸福，以“大我”替代“小我”“自我”，将人民放入心中，将创造人民幸福作为工作重中之重，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为民所为”。

（三）“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

“为人民服务”在更高层次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施“福”于人才是“幸”，即“福善之事皆称为幸”。“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⑤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极高境界的“幸福观”，并成为每一位党员身体力行的现实行为准则。毛泽东带领民众历经磨难求解放、谋幸福，为中国革命失去了六位亲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4~1095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24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42页。

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第71页。

人。他对人民群众无限忠诚,为了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与幸福安康奉献了毕生精力。他生活简朴,心中却装着所有的百姓,“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和真实的写照。周恩来把党的宗旨化为自己的灵魂,用无悔无怨的具体行动奉献人民。他参与党的最高领导层工作时间长达49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淡泊名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晚年在胸前一直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把“服役”精神上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境界,是人民勤务员的光辉典范。方志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足以战胜敌人。只要是为了人民,哪怕是利刃断颈,哪怕是流血牺牲,也毫不畏惧,也心甘情愿。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持续关注最基层人民群众,倾听民众心声,他们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幸福目标。

(四) 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为人民服务”“我为之”民生幸福观

1. 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许多革命者践行“我为之”的幸福观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血腥大屠杀后,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战火纷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星火燎原,二万五千里长征英雄史诗的惊天动地,抗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解放战争百万雄师的摧枯拉朽……无数的革命先烈“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万众一心,铸就我们伟大民族,接续中华灿烂文明。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家庭率先垂范,六亲殉国,满门忠烈,有多少次的肝肠寸断化作倾盆泪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瞿秋白微笑面对死亡和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夏明翰写下的生命绝唱、龙潭三杰中的胡底和钱壮飞、战死在林海雪原的杨靖宇、新四军的大将彭雪枫,还有很多在敌后工作的先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李白烈士那永不消失的电波、江竹筠在“渣滓洞”惨遭手指夹竹棍毒刑的坚贞不屈、15岁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毛岸英、堵枪眼壮烈牺牲的黄继光……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为人民服务”幸福观的杰出代表。

2. 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征途中,许多劳动者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观

在为中华民族崛起的科技战线,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两弹元勋邓稼先、氢弹之父于敏、毕生奉献于核潜艇事业的黄旭华、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太空公民杨利伟,还有陈景润、袁隆平等许多科学家,鞠躬尽瘁一辈子,有的隐姓埋名几十年,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语)和民族的振兴。

在经济建设的平凡岗位上,如我们时刻感受到“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的公仆”焦裕禄紧贴在群众脉搏上的心跳,目睹到孔繁森跋涉在雪域高原的脚步,领略

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任长霞深入虎穴、智斗歹徒的机警。又如退休的地委书记杨善洲把花了20多年心血种植起来的价值3亿多元的林场无偿捐给了国家，累立战功的李延年和张富清转业后仍然艰苦奋斗，将华西村建设成为“天下第一村”吴仁宝，将南街村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王宏斌，农村妇女的杰出代表申纪兰，他们一生都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观。

五 “以人民为中心”：从幸福观到民生幸福观的升华

在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观主要针对百姓翻身解放、工作、生活与平等，是接地气的、大众化的偏重于“格物”的幸福观。进入新时代后，由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人民服务的内容、范围都有所变化，民生和幸福的重点也随之有所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新时代“为人民服务”幸福观的升级版。

（一）“以人民为中心”民生幸福观的基本概念与深刻意蕴

1. “以人民为中心”民生幸福观的基本概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幸福观，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基础，继承和丰富发展“为人民服务”幸福观思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相统一的民生幸福观；是既有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也有制度保障、民主平等的幸福观；是既有发达的文化事业，也有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幸福观；是具有深邃文化基因特色的“天下大同”民生幸福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高理想境界的民生幸福观。

2. “以人民为中心”民生幸福观的深刻意蕴

实现对中西方幸福观传统基因的吸取与超越。“以人民为中心”民生幸福观是对传统“幸福观”的超越，充分吸取了中西方传统文化基因中对个体和群体“我为之”的幸福观，既超越西方当代学者的“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的幸福观，也超越中国古代学者的“格物”的幸福观，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有价值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德与道、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等思想在现时代的发扬光大，因而是融合中西方文化基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民生幸福观。

体现对“为人民服务”幸福观的继承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民生幸福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幸福观的科学内涵。“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坚持党和国家及其工作人员要继续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基础上，人民主体地位和中心地位更加突出，为人民谋利益的要求更高更具体，复兴民族大业的目标更直接更明确，作为党的执政理念的意味更强。

体现对《共产党宣言》核心命题的遵循和实践。《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

义的宣言书，其核心命题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全人类的解放和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以人民为中心”民生幸福观，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我为之”的民生幸福观，是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民生幸福观，同时还是超越国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生幸福观，因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高境界的国际主义民生幸福观。

（二）“以人民为中心”：大难见大爱的民生幸福观光耀世界

中华民族每当处于大灾大难的危急关头，如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2003年初非典疫情和此后多次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来临，亿万人民都能团结一心共克时艰，许多人为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挺身而出，视死如归，冲锋在前。又如每次中国侨胞在国外遇到骚乱、战乱、地震等危难，中国政府都是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海、陆、空甚至动用军事力量撤侨，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令世人为之惊羡和赞叹。

在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涌现了许多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广大医护人员和人民解放军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不畏生死、主动请战、冲锋在前，“我是医生，我有责任去救死扶伤”“我是党员，我先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弘扬新时代的斗争精神，涌现了许多舍己为人的感人事迹。这次抗击疫情的实践闪耀着“以人民为中心”民生幸福观的熠熠光辉。一方面，所有的医疗保障举措、联防联控机制和生活保障措施，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人民至上”的立场和理念；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并高度严密地组织群众参与疫情防控，形成了强大的“内生动力”，深刻印证了毛泽东的名言“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次抗击疫情的实践，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中高效决策，全国统一行动展现的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为世界所罕见，闪耀着新时代民生幸福观的熠熠光辉，赢得了世人的高度赞赏。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间大义观。逆行而上的广大的医护人员、人民子弟兵、最基层干部和志愿者就是这次疫情中最勇敢的人！这次抗击疫情的实践，堪称是一部“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雷锋一样的利他主义”“群众路线”“社会化大协作”等汇聚成的协奏曲。党的统一领导、党的基层组织 and 群众路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这些中国的制度优势是我们这次能够较快控制疫情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幸福观底色。

六 内涵揭示：民生幸福观的多维解读

过去人们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吃饱穿暖、有遮风挡雨之处，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对幸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

要发展到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就个体而言，童年时以有好吃好穿、有家庭之爱为幸福；成人后以有理想的工作、有足够经济实力为幸福；年老后便改变为以身体健康、老有所养为幸福。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公民以没有战乱、安居乐业为幸福；现在多数国民的幸福，是有房有车、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能呼吸新鲜空气。党中央提出新时代的“民生幸福观”，是从个人幸福上升到集体幸福的全民幸福，是奋力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平幸福，是全社会乃至“天下大同”的幸福，具有人口素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多维度的内涵。

（一）人口素质维度的民生幸福观：德智体美劳“全面自由”发展

1. 人口素质维度的民生幸福观体现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民生幸福与否首先体现在全体国民的个体素质上，而全体国民的个体素质如何，又决定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青年强则国家强。要把全体国民培养成高素质人才，就应该使每一个受教育者获得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对于人的成长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社会对人的培养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协调结合”。毛泽东和习近平遵循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都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使受教育者获得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接班人是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只有全国青少年都得到了全面发展，才具有全体国民幸福的起点和基础。

2. 人口素质维度的民生幸福观体现在德智体美劳“自由发展”

“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主题。“人的自由解放”是指每个人都克服了人性的“异化”，既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性”，又摆脱了“对人的依赖性”，实现了人本质的回归，成为真正的“自由人”。马克思同时又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而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发展”，需要有非常发达的生产力和充裕的物质基础、良好的教育文化和先进社会制度等外部条件作保障。这是党和政府落实民生幸福观的战略任务。

3. 人口素质维度的民生幸福观还体现在“我为之”。

微观角度是“我”对别人、对社会做出了的贡献；宏观角度是有多少个体愿意对别人、对社会、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及其贡献多少。对“我为之”的考察，实际上对以下五个维度都是适用的。

（二）经济维度的民生幸福观：劳动创造与经济享受相统一

1. 经济维度的民生幸福观首先体现在“劳动创造幸福”

马克思认为，人类是通过劳动而不断进化的；而劳动可以让人类力量得到施展，因而劳动是人的根本的生存方式。人是从事自由自觉劳动的主体，只有通过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4页。

动才能使自己身心得到解放,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而只有劳动才是幸福的源泉。

2. 经济维度的民生幸福观还体现在切实的“格物”获得感

获得感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格物”的获得与满足,如何分配经济发展成果将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幸福感。因此,在成果分配的问题上,应让人人都能共享发展与改革的成果,让人们感受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劳动和收获成正比的获得感。

幸福感既可以来自“格物”的获得与满足,也可以来自感性和理性上的主观感受,更来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我国大规模实施的众多民生工程、扶贫工程、广覆盖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等,不但使人民群众享受到“格物”客观获得的幸福感,也使人民群众在感性与理性上获得了主观感受的幸福感,更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济维度的民生幸福观还要体现在经济安全感上,即在不损害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没有社会动乱,物价稳定,不受通货膨胀之扰,人人都能安居乐业,成为高安全感的幸福之人。

(三) 政治维度的民生幸福观: 责任权利相统一与德法规制相协调

1. 民生幸福观要体现责任与权利相统一

民生幸福观首先是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能够得到实现。宪法规定,公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权、批评和建议权、宗教自由、人身自由、受教育权和劳动者劳动和休息的权利等,公民在政治上的幸福感主要来自这些民主权利得到实现。同时,只有公民的责任与权利相统一,广大公民才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建设国家的具体工作中去。

2. 民生幸福观要体现德治与法治规制相协调

我国千百年来奉行儒家以“德治”为先、“法治”为后的“德法”相辅相成的治理方式。“德治”体现的是“仁政”思想,注重以德化人、以德服人,重在事前预防和防范,具有正面、积极的治理作用;而“法治”则主要展示出“依法办事”的严明态度,是对不法行为的事后惩罚与打击,表现出消极的治理方式。西方发达国家被认为是“法治国家”,比较机械地遵循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原则。但是在烦琐的法条和庞大的法律体系下,平民百姓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得真正的幸福观。在我国德治与法治规制相协调治国模式下,民众既能感受到社会的“仁义”之爱,又有法律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享受到“德法”协调的“民生幸福”。

(四) 社会维度的民生幸福观: 公平正义共享的和谐社会

1. 公平正义是民生幸福观的题中之义

现实中落实民生幸福观,要求贯彻“公平优先”原则,要求在经济社会资源利

用和配置中，既要保证代内公平，又要保证代际公平；在管理者决策中，对于微观个体的获得和发展而言，既要保证机会均等，公平公正，还要保证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

就落实民生幸福观的具体内容而言，公平正义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民生基础不存在地域差异的城乡公平与区域公平上。公民拥有受教育及劳动、休息的权利，不论什么年龄、性别或是健康与否，每个人都能享受同等的社会资源，都拥有同等享受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权利。

2. 和谐共享是民生幸福观的客观要求

就国内而言，民生幸福要体现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即人人都能公平地全面享受到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疗与社会保障等成果。因此，只有全民共享和全面共享，才能共建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民生幸福的社会。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只有世界各国和谐共享的社会才是民生幸福的社会。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属于世界，因此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到2019年10月底，共签署197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五）文化维度的民生幸福观：通俗与高雅并存和世界多种文明兼容并蓄

1. 文化维度的民生幸福观应当通俗与高雅并存

广义的文化涉及科教文体卫等多项内容，既包括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也包括“高大上”的经典国粹文化。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世代相传接受着该独特文化的洗礼，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百花园。例如，民间的剪纸文化和老北京的胡同，大众化、平民化而又不失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之情和对“乡愁”的记忆。而长城、大运河、民族文化、景德镇陶瓷及京剧等，则形成我国高雅文化殿堂。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顶级智慧，是值得国人骄傲与自豪、世界闻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因此，民生幸福不仅要包容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还能弘扬文明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生幸福观要求创作更多富含正能量、保质保量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文化产品，以传承本民族通俗与高雅并存的文明。

2. 文化维度的民生幸福观应当世界多种文明兼容并蓄

新时代文化维度的民生幸福观甚至超越国界。世界文明是个百花园，各国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深厚土壤，我们应从璀璨夺目的世界文明中汲取文明智慧之果，让我国文明能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文明取长补短，让人民从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互学互鉴中获得富含文明记忆的“民生幸福”。

（六）国际维度的民生幸福观：对人类较大贡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争取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立场

中国素有“天下大同”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素有国际主义的胸怀，立足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争取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新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对外关系。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加入WTO后，致力于通过自力更生增强国力，从不掠夺侵略他国财富。我国扶贫已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人口减贫的贡献。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更多地承担了国际主义义务，彰显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坚持共享共赢原则，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国际主义的伟大胸怀

世界各个国家组成“大家庭”。要使这个“大家庭”每一成员都过得幸福，必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行事准则，跨越国界，互同凉热，风月同天，守望相助。当一国受难，其余国家无国界地进行援助，伤他国之痛，乐他国之幸，助他国之难，向世界展示出国际民生幸福。通合作、创共赢是国际民生幸福的强力助推剂。中国在国际组织世界舞台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七 定量描述：民生幸福观的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文民生幸福观的六个维度，本文构建了19项微观和宏观的“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由于微观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个体或家庭的实际获得感，而民生幸福观是反映群体或整体的概念，所以进行微观指标与宏观指标的比较，才能显示社会的公平正义程度，才能真实反映民生幸福感。

就此表做以下说明。

①表中第一个人口素质维度主要采用国家统计局目前的指标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衡量标准。同时参考了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社会指标体系，适当吸收日本的“国民纯福利”和法国的经济福利指标体系的有益内容。后四个维度的指标较多地借鉴王艺等建构的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①一文中的指标并有所调整。

②具体评估测算时，各个具体指标可以参照国家统计局目前采用的指标体系中的细分指标及计算方法。

③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来自环境保护部“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 $0.25 \times \text{生物丰度指数} + 0.2 \times \text{植被覆盖指数} + 0.2 \times \text{水网密度指数} + 0.2 \times \text{土地退化指数} + 0.15 \times \text{环境质量指数}$ 。

^① 王艺、程恩富：《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幸福指数”探究》，《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

表 1 “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六个维度	微观指标	宏观指标	反映主体的状况
人口素质维度	健康	健康保障	人口个体素质
	寿命	国民寿命	
	教育	国民教育	
	我为之	我为之贡献的个体及数量	对别人、社会、人类的贡献
经济维度	收入	可支配收入与分配结构	经济状况
	资产	国民资产与国民产值	
	住房	国民住房	
政治维度	自由	公民权利保障	生活区域的自然环境和公共安全环境
	民主	政治参与程度	
	安全	公共安全	
社会维度	环境	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和社会保障水平
	性别平等	国民就业	
	家和人和	家庭稳定性 社会和谐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文化维度	闲暇	国民闲暇	广义文化精神需要的满足状况
	文娱	文娱消费	
	自我实现	发展机会	
国际维度	所得	外贸依存度	对国外物资与技术条件的获得和国际贡献状况
	贡献	国际贡献率	

④妇女发展指数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合作研究课题组发布，由生命健康（0.2）、教育（0.2）、经济（0.2）、政治和决策参与（0.2）、家庭（0.1）、环境（0.1）六个分领域指数加权生成。

⑤社会保障发展总指数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中心设计，由养老保障指数、医疗保障指数、就业保障指数、贫困保障指数四项分指数加权计算得出，而每项分指数又由其下属的覆盖面指数、保障度指数、持续性指数、高效性指数加权计算得出。

⑥国际维度中的“所得”包括来自国外的个体生活品与工作条件；“贡献”指个体对国外的物品、劳动或技术贡献。

On the View of the People's Happiness of the Communist

XIE Yuantai, LI Donglian

Abstract: To thoroughly study the “cultural genes” and “cultural co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cept of people’s happines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three major resources of Marxism,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reig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build the people’s happiness of Chinese socialism, we must not only inherit and develop Marx’s “view of happiness”, but also absorb the essence of the previous sages’ “view of happiness”. Unlike the bourgeois happiness concept, which core is “I occupy”, the Marxist happiness concept is “I do it.” Marxism revealed the noblest happiness view, which is “Struggle for communism”. “Serving the people”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view of people’s happiness. “Adhere to people-center” has become an upgraded version of the happiness concept of “Serving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people’s happiness in the new era has connotations in terms of population quality,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ing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eople’s happiness should also be carried out in those six dimensions.

Keywords: People’s Happiness; Cultural Genes; Communists; Serving the People; People-Center